

XIANDAI HANYU
QIYI SHIBIE YU XIAOJIE DE
..... RENZHI YANJIU

现代汉语歧义识别 与消解的认知研究

◎ 周明强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XIANDAI HANYU
QIYI SHIBIE YU XIAOJIE DE
RENZHI YANJIU

现代汉语歧义识别 与消解的认知研究

◎ 周明强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歧义识别与消解的认知研究 / 周明强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308-07908-2

I. ①现… II. ①周… III. ①汉语—语义—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1470 号

现代汉语歧义识别与消解的认知研究

周明强 著

责任编辑 田 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求是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908-2

定 价 42.00 元

序

周明强的《现代汉语歧义识别与消解的认知研究》是一项富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而且,这项研究的创新内容涉及语言学的许多方面,其中几个重要的方面,如言语社区、言语互动、语言认知等,都是关乎语言的基本属性的内容。因此,虽然研究针对的是“现代汉语中歧义的认识与消解”的问题,从研究的视角和性质看,它不仅对现代汉语中的歧义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普通语言学层面的一些新启示。

在介绍歧义问题的研究时,作者指出了它在语言学领域中所涉及的许多方面,如词汇、句法、语义、语用、语境、信息处理、语言习得、语言变异、言语社区等。然而,在回顾和总结了以往已有的研究停留在超语境的结构层面和无视语言使用者因素的偏向之后,作者提出了应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来解决歧义的认识与消解问题的崭新视角。

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立场是,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人现象:在语言问题上,个人总是服从于社会的。语言的歧义现象也不应该例外。认知语言学侧重将语言作为一个认知现象来研究,这与社会语言学并不冲突。因为语言作为一个认知现象,也不是脱离社会的。歧义可以解释为语言的一种形式对应于两种以上意义的情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受到社会环境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的,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匹配的对称和不对称情况也都是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的。具体来说,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差异在语言方面可以显示得淋漓尽致。将歧义现象怎样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作为研究的重点,将讲话人群体之间对歧义的认识差异和社会互动怎样消解歧义作为研究范围,该项研究确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也确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路线。

作者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收集人们对歧义句的反应。他调查了小学生、中学生、中文专业和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少数民族学员、留学生以及

非学生群体的“社会成员”等多个群体,总计近700人次对数十例歧义词汇和句法结构的判断,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统计结果结合语义、语法、语用、语言习得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解释。这些解释有力地支持了社会语言学关于言语社区是语言结构系统的载体论断。全社会统一的关于歧义结构的判断,即使是限于本族讲话人的范围,也是比较个别的现象。然而,大部分语法学家确认的歧义结构却仍然被大部分,而且是包括非母语讲话人的大部分调查对象所辨认出来。这是对言语社区的对立统一的同一性的有力证明。掌握“现代汉语”的言语社区成员,不是一个个不折不扣的“标准”讲话人,而是一些具有大致相同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规范的语言实践者。

歧义消解的研究似乎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是,对其进行理论性的分析是任何有效率的应用的前提。脱离语境的语言研究成果往往难以引入应用层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境是语言使用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里,研究者进一步开展了定量研究,他发现,歧义结构的现实反应几乎从来都不是均衡的,不同语义的激活度呈现出系统性的群体差异。不仅如此,它们还受到话语环境的影响和言语互动模式的影响。然而,虽然是不均匀的,语义指向都有群体和社区层次上的明显的倾向性。这就是语义方面的社会层化结构。由此可见,以往那些超语境、超群体、超社区的歧义处理机制距离应用该是多么遥远和纸上谈兵。

本书所进行的研究,通过歧义识别和消解的窗口,展现了“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的现实的一面;它是语言标准和语言变异对立统一的一面,也是言语社区层化结构的一面;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是语言怎样存在于其社会环境的描摹。从本质上看,它是语言及其语法结构产生于丰富多样的社会言语活动之中的证明。

徐大明

2010年7月5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现代汉语歧义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
一、现代汉语歧义研究之回顾	(2)
二、现代汉语歧义研究之前瞻	(8)
第二节 歧义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10)
一、结构的视角	(10)
二、语义的视角	(11)
三、信息处理的视角	(14)
四、语用的视角	(16)
五、认知的视角	(19)
六、社会的视角	(22)
七、对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评价	(24)
本章小结	(26)
第二章 歧义识别与消解的社会认知	(28)
第一节 歧义与认知	(28)
一、语言表达与歧义	(29)
二、语言理解与歧义	(30)
三、语言认知的特点	(32)
四、言语社区与歧义认知的差异性	(41)
五、歧义的识别与消解	(43)
第二节 本书研究目的与方法	(46)
一、研究目的	(46)
二、研究方法	(47)

第三章 词汇歧义的认知差异	(56)
第一节 歧义词语的认知调查	(56)
一、词语歧义的认知过程	(57)
二、词汇歧义认知的调查结果	(60)
第二节 影响词语歧义识别的主要因素	(65)
一、词语歧义辨识与词义隐显的关系	(66)
二、词语歧义辨识与社会认知的关系	(68)
三、词语歧义辨识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	(69)
四、词语歧义辨识与言语互动的关系	(69)
五、词语歧义辨识与性别的关系	(72)
第三节 认知域对词语歧义识别的影响	(74)
一、认知域及其特点	(74)
二、认知域与词语歧义辨识	(78)
本章小结	(87)
第四章 句法歧义的认知差异	(89)
第一节 句法歧义的形成与认知调查	(89)
一、句法歧义的形成与认知	(89)
二、句法结构歧义认知调查的结果分析	(91)
第二节 句法结构歧义的认知情况分析	(94)
一、汉语社区使用者对句法结构歧义的认知	(95)
二、非汉语社区使用者对句法结构歧义的认知	(102)
第三节 认知模式对句法结构歧义识别的影响	(106)
一、认知模式的特点与类别	(106)
二、认知模式与汉语句法结构歧义	(112)
本章小结	(127)
第五章 词汇歧义消解的认知机制	(131)
第一节 词汇歧义消解的心理机制	(131)
一、词汇歧义形成的原因	(132)
二、词汇歧义消解的过程	(135)
三、词汇歧义消解的认知模式	(137)
第二节 词汇歧义消解的认知调查分析	(141)
一、词汇歧义消解在意义类型上的差异性分析	(141)

二、词汇歧义消解在性别上的认知差异分析	(148)
第三节 词汇歧义消解的认知过程分析	(157)
一、词义层次网络认知模式与歧义消解	(158)
二、激活—抑制认知模式与歧义消解	(159)
三、词义通达认知模式与歧义消解	(161)
四、特征比较认知模式与歧义消解	(162)
本章小结	(165)
 第六章 句法歧义消解的认知机制	(169)
第一节 句子理解与歧义的形成	(169)
一、对句法结构的接受程度	(170)
二、句法结构加工的剖析策略	(171)
三、句法结构记忆的容量	(172)
第二节 汉语句法歧义消解的心理机制	(173)
一、组块在层次结构歧义消解中的作用	(175)
二、指向在层次结构歧义消解中的作用	(176)
三、转换在层次结构歧义消解中的作用	(177)
第三节 句法结构歧义消解的认知调查结果分析	(178)
一、结构层次不同形成歧义的认知	(179)
二、语义关系不同形成歧义的认知	(186)
三、语义特征不同形成歧义的认知	(190)
四、语义焦点不同形成歧义的认知	(195)
五、语义指向不同形成歧义的认知	(201)
六、语义指向、语义特征都不同形成歧义的认知	(203)
第四节 句法歧义消解的认知机制	(206)
一、结构层次不同形成歧义的消解	(206)
二、语义关系不同形成歧义的消解	(210)
三、语义特征不同形成歧义的消解	(212)
四、语义焦点不同形成歧义的消解	(215)
五、语义指向不同形成歧义的消解	(224)
六、语义指向、语义特征都不同形成歧义的消解	(225)
本章小结	(228)

本书结论	(230)
一、歧义认知的差异性 _是 言语互动不平衡的表现	(230)
二、歧义认知的方式受社会言语互动的 _{影响}	(232)
附 录	(235)
附录 A:容易产生歧义的词语表	(235)
附录 B:语义理解情况调查(问卷调查)	(237)
附录 C:语义理解情况调查(互联网调查)	(243)
参考文献	(252)
后 记	(265)

第一章 绪 论

歧义(ambiguity)是语言形式与意义不对称的表现,是语言运用中出现的一种语言形式能传递多种语义、作多种解释的语言现象,或曰多种意义采用了同一语言表现形式的现象。歧义在语言中大量存在着,它们有的表现在短语上,有的以句子的形式出现。人们一般把能引起歧义的短语称为“歧义短语”,把能引起歧义的句子称为“歧义句”。本书将歧义分为词汇歧义和句法歧义两类:词汇歧义是由多义词进入短语或句子语境形成的;句法歧义是由短语或句子的结构能产生多种理解而带来的。传统说法的“歧义短语”和“歧义句”都存在本书所讨论的词汇歧义和句法歧义两种情况。

“歧义认知”包括歧义的识别和消解。本书的“歧义识别”指的是在虚拟语境下对歧义的认知,即短语或单句在没有具体语境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设想它在什么语境下出现,会产生哪些意义。“歧义消解”指的是人们对于有歧义的短语或单句不能发现歧义的存在,即在自己的虚拟语境之中,将歧义的某一种意义确定下来,将其他意义淘汰掉的现象,也包括在其认知语境中根本就不存在其他的意义。本书的“歧义认知”研究,着眼的不是歧义现象本身,而是不同的言语社区、不同的言语接收者(包括群体和个体)对歧义现象认知的趋势。

第一节 现代汉语歧义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从吕叔湘、朱德熙先生 1951 年在《语法修辞讲话》中谈到歧义问题算起,现代汉语歧义研究已经有了近 60 年的历史,目前仍然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问题。近 60 年来的汉语歧义研究有以下特点: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从句法分析到句法—语义相结合的分析,到句法—语义—语用相结合的分析的不断递进的过程;在研究的对象上,经历了从研究语言本身的歧义到研究交际语言的

歧义,从歧义表达到歧义理解,从歧义的产生到歧义的认知的不断递进的过程;在理论的运用上,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转换生成理论,从句法论到语义论再到语用论,从一般语用论到认知论的不断递进的过程。近60年的歧义研究成就斐然,回顾这些研究,会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

一、现代汉语歧义研究之回顾

现代汉语歧义的研究从研究时间、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1—1965)

这一阶段是歧义研究的起始阶段,虽然成果不多,理论上开拓也不深,但几位语言学大师为我们留下了值得重视的论述。本阶段的主要成就是运用直接成分分析法和变换分析法来分析语法现象,重视语言分析中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并发现了句法中语义关系,对引导语法研究走形式和意义相统一的路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早注意并讨论歧义现象的是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1951年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语法修辞讲话》,首次提到五种“歧义”现象:(1)两种解释一正一误,如“一边站着一个孩子,看来年纪还很小”一句,让人拿不准有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2)两种解释都可能,如“各个班以四个人组成了检查小组”这一词组,既可解释为只有一个检查小组,这个检查小组由四个人组成,又可解释为有两个或以上的检查小组,每个小组都由四个人组成;(3)因附加成分不同而引起的歧义,如“介绍菲律宾的一种权威著作”,第一层既可是介宾结构,也可是偏正结构,结构不同,意义自然也不同;(4)两事混杂,如“两辆深蓝和银灰的小汽车”这一词组,既可解释为两辆颜色一样(深蓝间银灰)的汽车,也可解释为一辆深蓝和一辆银灰的汽车;(5)把读者引入歧途,如“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共同纲领颁布了,妇女在法律上是平等了”一句,最后一分句可理解为“妇女彼此之间在法律上平等了”,也可理解为“妇女和男子在法律上平等了”^①。该书属普及性读物,只是从为语法学习者解说歧义的需要出发列举了这五种歧义,并未在理论上对歧义作更深入的探讨。1959年,赵元任发表了《汉语中的歧义问题》(Ambiguity in Chinese)。分析了在“鸡不吃了”中,“鸡”既可指施事也可指受事,所以隐含两种结构和两种意义。文章还对歧义的界定、歧义的分类、歧义的成因、歧义的分化、歧义的消解以及歧义度等重要问题

①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262—269页。

作了讨论。^① 文章关于“施事”、“受事”的分析,首次涉及用语义关系理论分析汉语歧义,因此,对后世的歧义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1960年,文炼的《论语法学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从语法的形式和意义关系的角度,讨论了“一个工人的建议”、“对本报的批评”等“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形式,骨子里是两个不同的形式”^②的歧义问题。1962年,朱德熙的《论句法结构》用直接成分分析法和变换分析法分别讨论了“咬死了猎人的狗”和“屋里摆着酒席”的歧义,并在歧义分化研究方面作了深入的、有益的探索。^③ 1965年,吕叔湘的《语文札记》讨论了“他的老师当得好”这类句子的歧义。^④ 上述的歧义讨论开启了汉语歧义研究的先河。

(二)第二阶段(1978—1999)

20世纪80—90年代是歧义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阶段,歧义问题受到许多语言研究者的关注,歧义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也得到了不断更新,产生了不少颇具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一阶段歧义研究的主要成就是:重视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从研究内容看,“歧义指数”、“歧义度”、“歧义格式”等反映歧义特点的概念相继提出;从分析的理论看,层次分析、变换分析、语义关系分析等方法进一步得到运用,从语用平面分析歧义,从语境的角度分析歧义,也引起了重视;从歧义研究的目的看,歧义分化成了学者们研究歧义的主要目的。

这一阶段的歧义分析不是拘于结构层次的分析,而是重视结构与语义的联系,重视形式与内容的联系。如朱德熙(1978)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就“的”字结构判断句这一句式的歧义问题进行考察,提出了“歧义指数”及其计算公式: $P=N-M$ (P 表示歧义指数, N 表示动词的配价数, M 表示“的”字结构中出现的动词配价数目)。^⑤ 范继淹(1979)的《语言的信息》从信息传输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同形结构”歧义问题,讨论了语言形式与语义内容之间的矛盾,以及模式歧义与实例歧义的不同。^⑥ 徐仲华(1979)的《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列举并讨论了汉语书面语歧义的九种类型^⑦,该文引发了80年代前期关于歧义问

① 赵元任:《汉语中的歧义问题》,《语言学论丛》第15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5页。

② 文炼:《论语法学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2期,参见张斌《现代汉语语法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261页。

③ 朱德熙:《句法结构》,《中国语文》第8—9月号,参见《朱德熙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3—187页。

④ 吕叔湘:《语文札记》,《中国语文》1965年第4期,第287页。

⑤ 朱德熙:《“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1978年第1—2期,参见《朱德熙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5—230页。

⑥ 范继淹:《语言的信息》,《中国语文》1979年第2期,第93页。

⑦ 徐仲华:《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中国语文》1979年第5期,第339页。

题的热烈讨论。施关淦、吴启主(1980)的《〈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读后(一)(二)》,对徐文作了修正和补充,认为“句子有歧义不等于格式有歧义”,“句子有无歧义跟词语搭配有关”,强调要“注意区分具体句子的歧义和抽象的句法结构形式间的关系”^①。朱德熙(1980)的《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讨论了句法歧义的性质,多义句式分化(句法歧义成因),以及“不能分化的多义句式”,在歧义分析中运用变换理论,揭示了句法结构中的显性语法关系、隐性语法关系,概括了汉语歧义结构的类型和歧义格式。^② 沈开木(1983)的《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分析了副词“也”字句的歧义^③,他(1984)的《“不”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讨论了“不”的否定范围、否定中心,“不”字句的前提,以及与歧义的关系。^④ 马庆株(1985)的《述宾结构歧义初探》,考察了述宾结构中实指宾语和虚指宾语的歧义。^⑤ 黄国营(1985)的《现代汉语的歧义短语》,归纳了短语歧义格式。^⑥ 徐思益(1985)的《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现象》^⑦和王建华(1987)的《语境歧义分析》^⑧均对语境歧义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这一阶段,研究的重心是歧义分化问题。除了从结构层次分析外,很多研究者还引入了语义学、语用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歧义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解释。在歧义分化方法研究上也有许多重要发现。如石安石(1988)的《说歧义》对歧义类型、歧义格式以及“同形”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释,提出用“并列检验法”来分化歧义。^⑨ 王维成(1988)的《从歧义看句法、语义、语用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语义一句法层面的歧义生成机制和语用层面的理解机制。^⑩ 詹继曼(1990)的《关于同形结构的研究》对歧义分布类型、歧义分析的语义前提,以及歧义研究目的等问题作了研究。^⑪ 沈家煊(1991)的《“语义的不确定性”和

① 施关淦:《〈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读后(一)》;施关淦、吴启主:《〈汉语书面语言歧义现象举例〉读后(一)(二)》,《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第42页。

② 朱德熙:《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参见《朱德熙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9—281页。

③ 沈开木:《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第1页。

④ 沈开木:《“不”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中国语文》1984年第6期,第404页。

⑤ 马庆株:《述宾结构歧义初探》,《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90—101页。

⑥ 黄国营:《现代汉语的歧义短语》,《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第69—89页。

⑦ 徐思益:《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5年第5期,第337—341页。

⑧ 王建华:《语境歧义分析》,《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第13—16页。

⑨ 石安石:《说歧义》,《中国语言学报》(三),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页。

⑩ 王维成:《从歧义看句法、语义、语用之间的关系》,参见袁晖、戴耀晶编:《三个平面:汉语语法研究的多维视野》,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⑪ 詹继曼:《关于同形结构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100—107页。

无法分化的多义句》讨论了“语义的不确定性”与“歧义”的差别,并运用了“语义指向”理论、词语语义特征理论解释了造成歧义的原因,还运用预设与焦点、隐含、蕴涵、空位、移位等新理论多角度地分析了歧义。^① 另外,李峰(1994)的《论歧义制约》归纳了35种假性歧义格式,并讨论了歧义语句如何通过自身因素消除歧义。^② 柳广民(1995)的《歧义类型研究》提出了根据歧义源推算出各种歧义类型的歧义指数的方法。^③ 冯志伟(1996)的《论歧义结构的潜在性》将科技术语研究中的“潜在歧义结构”理论用来分析日常生活语言中所存在的“潜在歧义结构”。^④ 所有这些对将歧义研究引向纵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第三阶段(2000年以来)

歧义研究在21世纪初受到研究者的更广泛的关注,在不到10年里就发表了数百篇论文。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重视从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角度研究歧义问题,重视总结语言形式的规律,歧义格式、歧义分化、歧义成因、歧义消解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重视语言主体与歧义之间的关系,歧义与语用、歧义与认知的研究成了歧义研究的重要内容。

1. “歧义格式”的研究

汉语的句法结构形式丰富多样,因而“歧义格式”研究自然成了歧义研究的主要内容。这阶段的“歧义格式”研究吸纳了多种理论,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施春宏(2000)的《歧义现象的演绎分析——以一组层次构造歧义的系统性分析为例》以“V+N”及其扩展方式来分析“V+X+N”类的歧义(“X”为NP、AP、VP、NC),对歧义现象进行演绎分析,找出了以归纳法为主而形成的歧义类型的内在联系。^⑤ 何洪峰(2002)的《论双重歧义因素组合的结构》讨论了由“词语多义、结构层次不同、结构关系不同和语义关系不同”四类因素两两组合而形成的句法结构的16种歧义的可能性。“通过对16种可能组合的结构进行逐个分析”,论证了因双重歧义因素组合而带来的歧义增减和消除等多种影响。^⑥ 徐阳春、钱书新(2004)的《“N₁ + 的 + N₂”结构歧义考察》从谓词隐含结构角度探讨了“N₁ + 的 + N₂”结构产生歧义的原因和条件,认为“若该结构隐含的是同一

① 沈家煊:《“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分化的多义句》,《中国语文》1991年第4期,第241—250页。

② 李峰:《论歧义的制约》,《新疆社科论坛》1994年第2—3期,第80—87页。

③ 柳广民:《歧义类型研究》,《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第90—98页。

④ 冯志伟:《论歧义结构的潜在性》,《中文信息学报》1996年第4期,第14—24页。

⑤ 施春宏:《歧义现象的演绎分析——以一组层次构造歧义的系统性分析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第38—45页。

⑥ 何洪峰:《论双重歧义因素组合的结构》,《语言研究》2002年第3期,第39—48页。

意义的谓词,没有歧义;若隐含的是不同意义的谓词,则有歧义”,“什么样的谓词能激活取决于 N_1 与 N_2 的语义特征”。^① 陈一民发表了多篇关于歧义格式的文章:《歧义格式及其分类》(2004),从歧义结构项、变项类别、歧义源类别、单义式之间句法语义关系、生产歧义实例的能力等角度,对歧义格式作了全面的总结;^②《歧义格式的歧义指数》(2005a)对歧义格式与歧义源的关系、单歧义源歧义格式、多歧义源歧义格式的歧义指数及其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③《歧义格式的动态分析》(2005b)分别对歧义格式作了交集分析、归纳分析、限制分析和扩展分析。^④ 税昌锡(2005)的“ $N_1 + \text{在} + \text{NPL} + \text{V} + N_2$ ”歧义格式解析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对歧义格式进行了讨论,将“ $N_1 + \text{在} + \text{NPL} + \text{V} + N_2$ ”分化成十个歧义类例,分析了“在+NPL”不同语义指向的特点和作用。^⑤ 王红旗(2006)的《施受歧义产生的条件》讨论了与施事、受事相关的歧义现象产生的条件,认为“句法同形和动词的格框架”是两个必要条件,“动词的格框架对施事和受事社会属性的要求以及体词性成分的意义”是充分条件。^⑥ 于景超(2007)的“ $V + \text{了} + T + \text{的} + N$ ”结构的歧义试析》讨论了“ $V + \text{了} + T + \text{的} + N$ ”格式的多种切分、T 的语义指向变化影响歧义形成原因。^⑦ 所有这些对某个歧义的格式专门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歧义研究内容。

2. 歧义与语用关系的研究

在歧义与语用关系的研究上,其特色一是从语用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调查入手进行歧义与认知的研究。前者如陈一民(2005c)的《歧义结构意义优选的理论分析》从语言认知角度分析单义项的语义认知理解频率,根据这种频率的高低排出优势选择顺序(即“意义优选”)。^⑧ 徐以中(2003)的《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探讨》考察了副词“只”的位置与歧义之间的关系,得出“只”字句语用歧义的取值范围: $q > P \leq 2n - m - F - 1$ 。^⑨ 徐以中、杨亦鸣(2005)的《副词“都”的主观性、客观性及语用歧义》分析了副词“都”有“元语”和

① 徐阳春、钱书新:《“ $N_1 + \text{的} + N_2$ ”结构歧义考察》,《汉语学习》2004年第5期,第20—25页。

② 陈一民:《歧义格式及其分类》,《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103—106页。

③ 陈一民:《歧义格式的歧义指数》,《中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37—140页。

④ 陈一民:《歧义格式的动态分析》,《求索》2005年第2期,第165—168、28页。

⑤ 税昌锡:《“ $N_1 + \text{在} + \text{NPL} + \text{V} + N_2$ ”歧义格式解析》,《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40—47页。

⑥ 王红旗:《施受歧义产生的条件》,《语言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7—110页。

⑦ 于景超:《“ $V + \text{了} + T + \text{的} + N$ ”结构的歧义试析》,《语言科学》2007年第4期,第50—55页。

⑧ 陈一民:《歧义结构意义优选的理论分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9—112页。

⑨ 徐以中:《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探讨》,《语文研究》2003年第2期,第48—50页。

“非元语”(“客观性”和“主观性”)两种不同用法。^① 后者如尤庆学(2000)的《歧义度的调查与分析》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从接收者的认知角度分析了歧义结构的相对歧义度和绝对歧义度。^② 周明强(2004、2006)《歧义、歧解和用歧的认知问题》和《认知在歧义的辨识与消解中的作用》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分别从认知和语用的角度辨析了歧义、歧解、用歧的联系与区别,^③表达的歧义与理解的歧义不同以及认知在歧义消解中的作用。^④ 刘贤俊(2006)的《歧义句的可及性考察》通过简易实验调查,探讨了影响歧义句的可及性解读的六个因素。^⑤ 项成东(2005)的《歧义的认知机制》分析了语境、联想、激活在歧义认知上的作用以及歧义的认知机制。^⑥ 税昌锡(2006)的《VP界性特征对时量短语的语义约束限制——兼论“V+了+时量短语+了”歧义格式》从一个完整事件的三个阶段(活动、跨界、事态)的角度分析了“V+了+时量短语+了”的歧义格式特征、“了”的分布对“动词+时量短语”结构的句法语义的影响、功能认知和话语环境对时量短语的所指所起到的导向作用和微调功能。^⑦ 马明艳(2008)的《“每隔+数量+VP”的语用歧义认知研究》通过对“每隔+数量+VP”歧义认知度的调查,分析了人们对“每隔+数量”对应式的歧义认知度形成的原因。^⑧ 所有这些研究对探索歧义与语用关系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歧义分化和消解的研究

对歧义分化和消解的研究仍是这一阶段的热点问题。这一阶段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特点是从语义、语用的角度分析歧义的分化和消解问题。如延俊荣(2000)的《“挖深了”歧义成因及分化》从“挖深了”的构成出发,探讨其认知上的原因及分化手段以及理据,并从层次分析、语境、语音间隔、重音及“了”的不同等角度讨论了该格式的分化问题。^⑨ 杨亦鸣(2000)的《试论“也”字句的歧义》以“也”字句为例讨论了如何利用语音图谱来确定话语中心、排除歧义的问题。^⑩ 李芳杰、冯雪梅(2002)的《语义结构与歧义分解》认为“语法单位的内部成分间

① 徐以中、杨亦鸣:《副词“都”的主观性、客观性及语用歧义》,《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24—29页。

② 尤庆学:《歧义度的调查与分析》,《汉语学习》2000年第5期,第15—19页。

③ 周明强:《歧义、歧解和用歧的认知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4期,第83—90页。

④ 周明强:《认知在歧义的辨识与消解中的作用》,《修辞学习》2006年第5期,第42—46页。

⑤ 刘贤俊:《歧义句的可及性考察》,《语言研究》2006年第3期,第16—19页。

⑥ 项成东:《歧义的认知机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80—84页。

⑦ 税昌锡:《VP界性特征对时量短语的语义约束限制——兼论“V+了+时量短语+了”歧义格式》,《语言科学》2006年第6期,第19—28页。

⑧ 马明艳:《“每隔+数量+VP”的语用歧义认知研究》,《汉语学习》2008年第2期,第50—58页。

⑨ 延俊荣:《“挖深了”的歧义原因及分化》,《语文研究》2000年第2期,第26—29页。

⑩ 杨亦鸣:《试论“也”字句的歧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第114—124页。

存在着一定的语义关系,构成了一定的语义结构,通过语义格、语义指向和语义辖域等语义形式等表现出来,语义结构分析能较有效地分解歧义”。^① 何洪峰(2003)的《句法结构歧义成因的思考》认为“结构主义的思想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能统一解释替换不同语义成分消除歧义的现象和完全由语义因素而引起的歧义结构”,“是表层的解释”。主张“从深层结构揭示出句法结构的歧义原因”,认为“语义因素更富有解释力”。^② 赵春利、邵敬敏(2007)的《“NP₁ 有 NP₂ 很 AP”歧义格式的分化规则》分析了在“NP₁ 有 NP₂ 很 AP”句式,AP 的三种语义指向所形成的三种语义——描写评价义、因果解释义和歧义。指出“在语义理解时,按照认知的规则,首先是‘毗邻原则’起作用,其次才是‘推理原则’起作用”。^③

从歧义研究的三个阶段来看,歧义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是一个不断更新和递进的过程。第一阶段的歧义研究受结构主义的影响,重视结构分析,分析方法主要是结构主义的直接成分(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等,语义分析初露端倪。研究在内容上侧重实例分析,缺少系统的有价值的理论。第二阶段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仍占主导地位,受句法分析“三个平面”理论影响,句法、语义、语用相结合的方法受到重视。以分析歧义格式、歧义句式、歧义类型、歧义指数、歧义分化为重点,歧义认知(如“歧义度”有所涉及)开始进入视野,歧义消解偶有涉及。第三阶段结构主义仍有市场,语用的分析占主导地位,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从语用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调查入手进行歧义与认知的少量个案研究。歧义格式、歧义句式、歧义分化继续受到重视,歧义与语用的关系成为研究的重点,歧义认知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从歧义研究的过程看,歧义认知的研究是歧义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现代汉语歧义研究之前瞻

近 60 年来的歧义研究,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揭示歧义格式的特点,或探讨歧义消解的重要性,或总结歧义研究的方法,促进了现代汉语研究的向纵深发展。随着歧义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关于歧义与语境、歧义与认知、歧义与语言生活等从语言运用角度探讨歧义也逐渐得到重视。但纵观近 60 年来的汉语歧义研究,歧义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内容不够系统、研究

① 李芳杰、冯雪梅:《语义结构与歧义分解》,《武汉大学学报》2002 年第 6 期,第 745—750 页。

② 何洪峰:《句法结构歧义成因的思考》,《语言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26—31 页。

③ 赵春利、邵敬敏:《“NP₁ 有 NP₂ 很 AP”歧义格式的分化规则》,《语言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79—83 页。